

第 81 回 阿古柏入侵新疆 左宗棠力收失地

话说 19 世纪 70 年代，正当中国的洋务官僚有声有色地大办洋务事业，企图“求强”、“求富”，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的时候，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也就是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远东地区的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当他们把中国周围的国家差不多逐个攫为殖民地和保护国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中国的西北、西南、东南边疆几乎同时被侵略，出现严重危机。边疆危机惊破了“洋务派”的富强甜梦，是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族危亡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西北边疆的危机如何发生？狼烟为何在这里冉冉升起？这就得从 1864 年新疆的形势说起。

在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中国各族人民奋起响应革命，1864 年新疆地区爆发了回、维吾尔等族人民的起义，起义队伍先后攻占了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什噶尔旧城，并于 1866 年攻占伊犁大城（今伊宁），势力迅速扩及全疆。但是，这些武装起义的领导权大多数被宗教和民族上层分子所掌握，他们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煽动民族仇杀，相互攻伐，争战不已，造成了新疆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为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军队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1864年夏，原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柯尔克孜族人思的克攻陷了喀什噶尔的疏附（即回城，在今喀什市），遭到当地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抗，后思的克久攻疏勒（即汉城，喀什由汉城、回城组成）与英吉沙尔相持不下，于是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等向英国支持下的浩罕汗国求援，并请求浩罕国王将流亡在其境内的大和卓（“和卓”意为“显贵”和“富有者”，解放前新疆地区对伊斯兰教封建上层的称呼。大和卓名波罗尼都，新疆封建主玛罕木特的长子）之后裔布素鲁克遣回南疆，以便利用民族和伊斯兰教的旗号来复辟“叶尔羌汗国”。浩罕统治者抓住了这个扩张势力的良机，立即派军官阿古柏与布素鲁克在浩罕搜罗了一批武装力量，侵入喀什噶尔。阿古柏是一个贪婪残暴、野心勃勃的匪徒，他因残酷屠杀哈萨克人而得浩罕国王的赏识，由一个百人长逐渐提拔为“里亚什凯帕夏”（陆军军官），曾多次参与浩罕宫廷争夺王位的阴谋活动。

1865年1月，阿古柏率部来到喀什噶尔，立即将布素鲁克扶上汗位，随即与“主人”翻脸，把思的克一伙赶下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4月，阿古柏派兵攻占由思的克占领的英吉沙尔回城，将据守英吉沙尔汉城的2000余名清军杀害。9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向阿古柏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举家自尽。阿古柏占领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后，便开始向南疆的其他割据政权进攻。1866年秋，阿古柏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假借布素鲁克和卓名义致书割据和田的哈比布拉，请求允许他朝觐圣人陵墓。哈比布拉受骗出城迎接，即被阿古柏逮捕，以和田为中心的割据政权被吞并。接着阿古柏挥军东下，攻占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地，吞并热西丁和卓割据政权的地盘。至此，阿古柏完全占领了天山南路八城，决定乘势建立自己的“国家”。1867年夏，当他

将傀儡布素鲁克逐出新疆后，就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自称“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1870年，阿古柏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消灭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清真王”妥得璘（即妥明）政权，势力延伸到玛纳斯。至此，整个南疆（天山以南）和北疆（天山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阿古柏侵略军的铁蹄之下。

阿古柏建立的“哲德沙尔国”依仗神权挥舞屠刀，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血腥的统治。据记载，阿古柏在南疆“动辄就施放毒药，将反对他的人毒死。维吾尔族妇女全部遭到匪徒的奸淫，就连8岁的幼女也不能逃出魔爪，被奸污的幼童十有七八毙命。”在有的城镇，阿古柏甚至“把被征服者屠杀净尽”。与此同时，阿古柏匪徒还肆意掠夺新疆各族人民，他们把从农民手中侵夺而来的土地转手出卖，并向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一位维吾尔族的作者记录了阿古柏掠夺新疆人民的暴行：凡是水利建设比较完备、土地肥沃的地区，以至冬季草场和夏季草场，全部被没收，转卖给那些从前的管理人。阿克苏所属的阿克牙尔、柯坪、和什塔米、温巴什一带地方的土地卖了55.6万天罡两（每天罡两折合白银一两）拜城赛拉木的沃土卖了40万天罡两，其余南六城的情况也类似。阿古柏制定的税则规定：“佃农向政府交税，并把净收入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作为地租”。由于包税员的贪污中饱，“官员们征收的税额比法定要求高达三倍之多”。新疆人民对阿古柏的统治怨声载道。当时一个亲自到南疆“考察”的俄国人曾说：“阿古柏政权是极不得人心的，只是靠军事恐怖来维持统治。”阿古柏的信徒“把居民抢劫一空”，“不论是谁，凡是有点好东西，都被搜刮殆尽，比如粮食、牲畜、甚至妻子、女儿。”在阿古柏的蹂躏下，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破坏，昔日美丽的疆城，变成了“毒杀与系

狱，没收财物，死刑与拷打”的人间地狱。

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奴役新疆人民，而且出卖中国主权以换取沙俄和英国的支持。而俄、英侵略者则企图把阿古柏政权变为自己侵略新疆的工具，在支持阿古柏的同时，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英国便以“经商”、“游历”、“传教”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活动。1868年前后，英国的商品和军火开始从土耳其、印度不断涌进新疆。接着，英印政府即派遣茶叶种植园主兼富商沙敖赴喀什噶尔进行“非正式”访问，并赠给阿古柏一批枪支。在沙敖居留喀什噶尔的三个月中，阿古柏先后三次接见他，“并以最热情的态度对待他”。沙敖回去不久，阿古柏就根据他的建议，派出使臣前往印度邀请英国官员访问喀什噶尔。1870年英国外交部官员福赛斯率领第一个使团前往“哲德沙尔”，加紧同阿古柏的勾结。1873年英国又组成300人的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笔信及大批枪炮再次来到喀什噶尔。阿古柏受宠若惊，在接见使团时说：“你们的女王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她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慈善的政府。我渴望她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永远是拥有它的人的利益源泉。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茁壮成长。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缺少的”。表现出一副奴才对主子摇尾乞怜的丑相。翌年，英国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十二条。英国承认阿古柏的王国为“合法的独立王国”，阿古柏则给英国在新疆驻使设领事的特权，允许英国商品进入南疆只交纳值百抽二点五的进口税，英国臣民可以在阿古柏控制的地区购买、出售或租用土地、房屋或货仓。这年英国再次送给阿古柏1万支步枪和若干门大炮表示对他的友好和支持。

英国和阿古柏的勾结，引起沙俄的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已通过《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侵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 144 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随后又进一步对中国侵略扩张。沙俄扩张领土的矛头主要对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浩罕、布哈拉、希瓦）和中国的新疆地区，妄图吞并这些地区，向南打通一条通往印度洋的出海口。为吞并新疆，沙俄竭力与英国争夺阿古柏这条走狗。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沙俄便抢先与他签订“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行动，允许对方各有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利。1867 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尔克斯坦”，在塔什干设立总督府，并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把侵占我国新疆作为它的下一个目标。为把喀什噶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沙俄要求阿古柏同意“建筑一座横跨纳林河的桥梁和一条通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由于阿古柏不愿意受俄国的摆布，俄国的要求没有实现。1868 年，沙俄凭仗自己在中亚地区的扩张节节得手，派出使团到达喀什噶尔，要求阿古柏向沙皇称臣纳贡，企图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南疆地区纳入俄国统治的范围。沙俄的贪欲，更加深了阿古柏与俄国的矛盾，权衡利害后，阿古柏决定进一步投靠英国，以求得它的更多支持。

阿古柏同英国的勾搭，大大地惹恼了沙俄政府。为了阻止英国在新疆进一步扩大殖民利益，它开始策划以武力强占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1867 年沙俄先后迫使浩罕和布哈拉两个独立汗国臣服后，就不断派出军队侵入伊犁地区西部，进行军事挑衅。1870 年俄军强占了沟通天山南北的咽喉要地——穆索尔山口，并修筑通往伊犁的道路，随即又在伊犁西部天山和阿拉套山之

间集结两支部队，准备进攻伊犁。1871年夏，俄国土尔其斯坦总督考夫曼以安定边疆秩序为借口，下令进攻伊犁地区，伊犁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7月4日，俄军占领了固尔扎（今伊宁市），截断了阿古柏和英国向北扩张的通道，而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则沦于俄国侵略者残暴的殖民统治下。之后，沙俄派兵四处扩张，控制了北起塔城、额敏河，南至晶河（今精河）、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的准噶尔盆地西部地区。沙俄侵占伊犁后，挟其军事威势，派员出使喀什，于1872年6月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规定：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国”元首，阿古柏同意俄国人在南疆自由经商和游历，设置商务专员，俄国货物的进出口税仅按值百抽二点五的税率征收。此后，俄国的商货、军火不断输入南疆。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悍然宣布：“伊犁永远不归还中国”。侵略者撤销了中国政府设在该地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清政府的官员。对伊犁各族人民，沙俄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他们强行收缴民间武器，制造各种借口枪杀和流放中国人民。同时在新疆地区横征暴敛，规定按户征税，“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残酷的搜括，使伊犁地区成为沙俄在中亚“财政收入最多的部分之一”。对于沙俄的黑暗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所有满、绿（营）、索伦、锡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以同心能死，不降俄夷”。

沙俄对我国伊犁地区的侵略，是背着清政府偷偷摸摸进行的。1871年的5、6月，俄军已大举进犯伊犁，但俄国驻北京公使还装模作样地向清廷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清政府早日出兵，设法摒除阿古柏匪帮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表示俄国

愿意帮助清政府共同收复伊犁，而对沙俄已出兵伊犁一事丝毫未曾提及。在此之后两个月，俄公使才告知总理衙门，俄军已于 7 月 4 日“克复伊犁城池”。同时虚伪地表示：“愿将所得伊犁地面交还贵国”，要求清政府迅即派员前往接收”。但当清政府派员与俄公使进一步交涉时，该公使又出尔反尔，改称只有当清政府将“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方可交还。这时，清统治者才感到事态严重，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到伊犁与俄方谈判接收事宜。荣全抵达塔城，沙俄大感惊讶，它没料到清朝官员果真到来，于是寻找种种借口，故意拖延会谈的举行。先是拒绝荣全赴伊犁，继而一再修改会谈地点，再后又迟迟不派代表。荣全白白等了两个月，会谈终未举行。1872 年 5 月 18 日，当俄国再也找不出借口，会谈不得不举行的时候，俄方代表又在会谈时节外生枝提出通商、割让额敏河等一堆与交还伊犁毫不相关的问题相要挟。荣全问及归还伊犁问题时，俄代表竟厚颜无耻地说，“伊犁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荣全看出沙俄的野心决不只是向中国勒索大笔钱财，也不仅仅是要窃踞伊犁，而是要把中国的整个新疆地区攫为己有。于是拒绝了俄方的无理要求，返回塔城，伊犁问题由清政府在北京与俄国公使继续交涉。交涉中，俄方仍继续提出与荣全会谈时曾提过的种种无理要求，同时坚持只有当中国收复乌鲁木齐，伊犁与北京的交通畅行无阻时才能交还伊犁。沙俄政府认为，这是清政府难于办到的事，只要清军无力收复失地，自己就可以永远霸占伊犁。中俄在北京的交涉同样毫无结果。

正当阿古柏入侵南疆，沙俄强占伊犁，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日甚的时候，日本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于 1874 年夏悍然发动对我国台湾的侵略，东南海防顿时紧张。这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利用人们对东南海防关注的时机，

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东南海防之用的主张。李鸿章的目的是想乘此机会建立一支由他控制的北洋海军，以扩大其政治资本，巩固、加强其政治地位。李鸿章认为“海防”重于“塞防”，新疆离北京有万里之遥，就像一个人的手脚，“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而海疆离北京近在咫尺，如人的腹心，海疆一旦有警，立即就会动摇国家的根本，所以“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既然如此就应该加强海防，置船购炮。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不断支付战争赔款，连年镇压农民起义，财政状况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很难支付大笔钱财购置船炮。为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提出放弃塞防，对准备收复新疆的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把撤停的饷费“匀作海防之用”。对于阿古柏、沙俄侵占下的新疆，李鸿章则主张放弃对它的行政管辖，“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李鸿章放弃新疆的理由是：新疆地处边陲，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没有治理的价值。他认为乾隆年间勘定新疆是得不偿失之举，耗费了无数资财，收复了几千里无用的蛮荒之地，以后每年还要花费几百万两白银来维持它，实在不值得。李鸿章还说，当时的新疆已三面受敌，俄、英又同阿古柏立约通商，其势力已经深入新疆，清政府如果勉强收回，将来也“断不能久守”。而且外国船坚炮利，“炮弹所到，无坚不摧”，中国必须“力保和局”，决不能因为进兵新疆，开罪英、俄两国，给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李鸿章的主张，完全符合了英、俄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我国新疆的需要。

李鸿章的言论，挑起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两江总督沈葆楨、福建巡抚丁日昌、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等人附和李鸿章的看法，属“海防”派。山东巡抚丁宝楨、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

吴元炳、湖南巡抚王文韶、江西巡抚刘秉璋等人反对李鸿章的意见，属“塞防”派，他们认为朝廷应“以全力注重西征”。王文韶指出：新疆局势逼人，出兵新疆刻不容缓，“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师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坐镇西北的陕甘总督左宗棠。1873年，左宗棠平息了陕甘回民起义后，便把注意力转向被沙俄和阿古柏匪徒侵占的新疆。从此，左宗棠个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早在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时，左宗棠就认为：“俄人侵占黑龙江，我国东北的形势已日见紧迫，现今又占伊犁，其目的在于侵占我西北边疆，这是侵略者蓄谋已久的计划，敌人攻势神速凶猛，我方不能不急速防备。”当时左宗棠年事已高，病魔缠身，本来一再表示倦勤，打算告病乞休。但当西北边疆告急时，他却说：“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断然放弃“乞病还乡”的打算，决心“与此虜周旋”到底。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塞防”之争时，他上书朝廷，坚决反对李鸿章的主张。

李鸿章及“海防”派的官僚认为：凡是和中国接壤的国家，不过是步步推进，志在蚕食中国土地；而从水路远来的西方列强却是要制我要害，其志在鲸吞整个中国。所以“海防”重于“塞防”。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反驳：从海道而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为了“通商取利”，无占地之患，算不上中国最可怕的敌人。而俄国和中国陆地相连，多年来一直蚕食中国的土地，随着其野心的步步增强，将成为中国最严重的外患。中国应该“海防”、“塞防”并重。李鸿章认为，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得不偿失。左宗棠尖锐地指出，我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百多年来无告警的烽火，不仅明

代所设的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等 9 处北方要镇成为腹地，就是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一带也分兵屯戍，侦察敌情的土堡遥相瞭望，这样才使得京师之地太平无事，这些都是祖宗“开新疆、立军府的结果”。因此“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相反，如果新疆丢失，甘肃和蒙古将很快受到影响，接着陕西、山西乃至直隶和京师都将无安宁的日子。李鸿章认为，对新疆应该停兵撤饷，把费用挪于海防。左宗棠反驳说：就目前形势论，西方国家还不至于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贼氛极炽，收复新疆有燃眉之急。再说沿海船厂正加紧造船，购船的费用就可节省下来，加之海防本来就有固定经费，加强海防，所缺少的经费不多。而塞防经费却是大大不足，所部官兵连年欠饷多达 800 余万两，一年只发一月满饷，即使西北停兵撤饷，塞防的有限饷银对海防也无大的救济。左宗棠进一步说：就算丢掉新疆，中国也不过是把西北边防向后撤退而已，在外敌的威胁之下，西北各地的边防经费仍然必不可少。所以“停兵对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妨害”。

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批驳及收复新疆的主张，得到朝野舆论的广泛赞同。当时权力仅次于恭亲王奕訢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左宗棠的意见。他说，如果在西陲停兵撤饷，“则京师之肩背坏”，到那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中国如何抵御？他认为，左宗棠的军队已在陕甘地区长期作战，对西北的山川气候、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以左军出师新疆，盘踞天山南北的寇匪不难指日肃清。文祥的看法促使清朝的决策者慈禧太后和恭亲王采用左宗棠的意见，决定派大军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坐镇兰州的左宗棠接到朝廷任命后，立即制定西征战略计划，筹办粮饷，整编军队，为进兵新疆做准备。左宗棠根据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特点及敌我双方的情况，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方略。他命令清军在一个战役结束与发动另一个战役之间的准备时间要充分，故前进要缓；但一旦发动进攻，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敌人，速战速决，以避免“钝兵挫锐”。新疆地势北高南低，故历来有“控北制南”之说，左宗棠根据这一地理特点，制定“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提出先攻取乌鲁木齐，使清军处于高屋建瓴之势，然后下兵南路，勘定全疆。为避免分兵作战，左宗棠还利用英、俄矛盾，暂不触动伊犁，集中力量消灭投靠英国的阿古柏集团，将其盘踞的南疆、北疆地区收复，再图伊犁。收复新疆的军事实践，证明了左宗棠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在制定战略方针的同时，左宗棠还特别致力于军队的后勤筹备工作。他深知，对新疆用兵，战线长达数千里，沿途要涉过戈壁沙漠，翻越天山，其中的艰难险阻超过内地用兵数倍。西征军成功的关键在于后勤，在于筹粮、筹饷、筹转运。为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加紧采办。北路于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设“西征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开辟粮源；南路在陕西和甘肃地区采办。同时，利用俄国人，从其手中购粮 500 万斤。左宗棠还命令部下率队在哈密屯田，仅一年就垦荒两万多亩，为军队解决了一大批粮食。在筹备军粮的同时，左宗棠还多方组织运输力量，先后调集大车 5000 余辆，驴、骡 5500 头，骆驼 2.9 万峰，并命令部队进军时各人自带 8 天口粮，这样基本解决了军粮及运输问题。1876 年初夏清军军事行动前，已在哈密、古城子等前沿地区集中大批军粮，保证了西征的顺利进行。

此外，左宗棠还花费极大精力对部队进行裁并、整顿、集训，又通过上海的“采办转运局”，购买西方各国的先进军械弹药，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经左宗棠的一系列努力，西征清军面目焕然一新。一个亲眼看到这支军队的英国人说：“这支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左宗棠即派出先头部队，经过肃州（今酒泉）开赴新疆哈密等地。

清政府进兵新疆，收复失地，引起沙俄的恐慌。1875年7月，索思诺夫斯基率领俄国“学术贸易考察队”到达兰州，以“科学考察”为名刺探中国西部回民举事的情况及清政府的军事部署，估计该地区“未来的政治命运”，为沙皇政府提供“决定对中国西部和喀什噶尔的行动方式”的依據。索思诺夫斯基调查后会见了左宗棠，表示愿向中国运售军粮，企图使左宗棠的军队全部依赖于俄国的粮食，进而按照俄国的意图加以制约和控制，阻止清军在新疆的行动。

1876年3月，左宗棠将指挥中心移至肃州，随即开始了平定阿古柏匪帮的胜利进军。从8月开始至11月，西征军相继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把盘踞北疆的阿古柏势力扫荡殆尽。当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左宗棠决定屯兵北路，继续肃清残敌，就地整训部队，征集转运粮草，待明春向南疆进军。

清军收复北疆的胜利，引起英俄侵略者的极大不安。英国为保其在印度侵占的地盘不为俄人侵扰，竭力保护走狗阿古柏，阻止我国收复南疆。他们耍弄“调停”阴谋，为阿古柏乞降“立国”，提出让阿古柏“投诚”，条件是清政府允许阿古柏“保南城自王”，所治之地“作为清朝属国，祇隶版图，不必朝贡”，并以沙俄蓄谋侵占南疆相威胁，企图牺牲

中国在南疆的主权而维护阿古柏的实际统治。接到总理衙门转来的咨札，左宗棠痛加驳斥，指出英国的企图是：“彼阴谋为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对这种损人利己的图谋，中国怎能允诺？！同时表示，收复新疆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英国的图谋未能实现。

1876 年 11 月，沙俄派出库罗巴特金“特别代表团”到南疆和阿古柏进行边界谈判。当时的阿古柏，外有清军压境，内临民怨沸腾，统治正岌岌可危。库罗巴特金利用“阿古柏愈是内外交困，他就愈益倾向于尊重俄国臣民的利益”的时机，采取高压政策，迫使阿古柏同意按俄方“规定”的“边界线”划界，企图割占新疆西南部的大片领土和重要军事据点，从阿古柏这个半死人身上掠夺财物。但是，清军的迅速挺进，粉碎了沙俄的迷梦。

1877 年春，清军开始向南疆进军。连克达板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等城，摧毁阿古柏精心部署的防线，消灭阿古柏的主力部队，取得收复南疆的决定性胜利。阿古柏退守库尔勒，兵败援绝，服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自称为“汗”，继续挣扎。12 月清军攻克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入俄境。至此，平定阿古柏匪帮的正义战争大获全胜。

西征军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战争之所以节节胜利，与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和田、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各族人民就群起反抗。清军出关的消息传来，新疆各族人民“欣喜地欢迎”。他们主动地为清军送粮献马，直接参加战斗。清军攻取拜城、库车，两城人民首先起义，和阿古柏匪帮搏斗，清

。另一说是阿古柏同一司库斗殴，被打得昏迷不醒，半夜即一命呜呼。

军一到，就开城迎入。当清军攻取玛纳斯、乌苏时，伊犁一带的锡伯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赶到乌苏前线，协助清军作战。清军攻克阿克苏以后，哈尔俊地方的柯尔克孜族组成义军，沿途阻击败逃的阿古柏匪帮。塔吉克族人民也积极主动地迎接进抵莎车一带的清军，为收复家乡奋勇杀敌。左宗棠在奏章中呈述了新疆人民支持西征的情况：清军每到一地，当地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清军每克复一地，应办理的各种事项都委托回民头目承办，“数月以来，该回目等凡搜剿马贼，采办粮料柴草，侦探贼情，防守卡隘，均能督率回众办理无误”，“实属深明大义”。正是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军才迅速完成了征讨阿古柏匪帮、收复祖国失地的艰巨任务。

平定阿古柏以后，清军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国土。于是，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主要参考资料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版。

司马图强：《列强分裂中国纪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包罗杰（英）：《阿古柏伯克传》，1878年伦敦版。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故宫博物院1934年版。

宝鋈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82卷，第86卷，第87卷，第99卷，故宫博物院1930年版。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牋，第11卷；奏稿，第46卷，第51卷。

李鸿章撰、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1905～1908年刊，奏稿，第24卷。

罗正均编：《左文襄公年谱》第7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第 82 回 沙俄军拒还伊犁 曾纪泽修约俄京

话说沙俄侵占伊犁之初，曾认为清政府再也无力驱逐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于是表示，他们出兵伊犁，是替中国“代为收复”，一旦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地，俄国将立即把伊犁交还中国。

阿古柏匪帮覆灭后，清政府即要求沙俄履行诺言，归还伊犁。但俄国新任驻华公使布策却多方推诿，坚持“中国须将通商交涉各案先行办结，方可会议交还。”清政府与之反复交涉，毫无结果。不得已，只好按布策的意见，将交涉归还伊犁和引渡逃入俄境的叛匪问题就地交由左宗棠和俄国中亚殖民当局办理。1878年2月，左宗棠行文俄方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及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要求根据条约规定将叛国投俄的匪徒白彦虎等解回，沙俄在回文中却说这些人是“难民”，非但拒不引渡，反而要求清政府偿付他们逃俄后的生活费用。同年，清伊犁将军金顺又派人前赴阿拉木图，再次向俄方要求归还伊犁和引渡逃匪，但科尔帕科夫斯基却狡辩说：“逃人是走投无路才投俄境，我土尔克斯坦总督不忍心将其置于死地，这并不是我们要故意违背条约。至于交还伊犁之事，因事关重大，我个人不敢作主，待与总督考夫曼商议后再作决定。”而考夫曼则称：“有驻京公使在，本人不敢擅自决定”，“此事应由中国大臣与我驻京使臣议办”。俄方相互推诿，清政府三番五次同沙俄公使及土尔克斯坦总督交涉，终不得要领，于是决定派崇厚直接赴俄京谈判。

崇厚（公元 1826 年 ~ 1893 年）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办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兼管天津关税）。天津教案发生后，奉命赴法国“谢罪”，回国后擢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后任盛京（今辽宁沈阳）将军。崇厚长于逢迎外国侵略者，“外国人普遍地喜欢他”，认为他具有“令人愉快的品格”，因而博得了洞悉洋务的“声誉”。1878 年 6 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授予他“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权利，朝廷颁发的谕旨称：“崇厚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俄都彼得堡驻扎，相机办理。”

崇厚是一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在他出发前有人就对清廷给他以全权大臣的头衔和权利表示不放心，说：传说崇厚决定由南洋取道地中海、黑海前往俄都彼得堡，真是令人费解。他此行的关键任务在于收回伊犁，赴俄前应该身历西陲“体察形势”，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在双方争辩时击中对方要害。而今他却决定从海道前往俄都，不知边塞的实情，不了解左宗棠的成算，怎能做到成竹在胸，谈判时难免“一味迁就”模棱其辞，“不必许而许之”、“不必缓而故缓之”，最终必定贻害国家，错失良机。应让崇厚取道新疆前往俄国，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这样才不会受骗上当、悔恨莫及。同时还指出，不应给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头衔和权力，应令其到俄国后，遇有重大决定迅速上报朝廷，自己等候谕旨行事，否则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追悔何及！但是崇厚自恃有朝廷宠信，竟于国家利益而不顾，不愿涉足艰苦的西北，依旧取海道赴俄。

1878 年底，崇厚一行抵达彼得堡。沙俄为通过这位“全权大臣”向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对其百般笼络，特别提高接待规格：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使团；崇厚“从旅馆